

錢德明神父的三清茶詩碗

Kee H Choi Jr.
胡欣以 著 譯

一件傳入路易十五宮廷的清宮御瓷

本文記錄了十八世紀六〇年代末期，一批中國御製瓷碗以一非常之途徑傳入法國。曾事奉乾隆皇帝的耶穌會教士錢德明神父將這些寫有御製詩文的茶碗獻給了時任法王路易十五內政部長亨利·李奧那多·貝爾丹。一七四六年的秋天，乾隆皇帝作《三清茶》詩一首。此詩頌揚的是三清茶所蘊涵的美德寓意：以梅花，松子以及佛手入茶烹製，三清茶結合此三物清香之氣，象徵性格的耿直高潔。而題有三清茶詩的茶碗亦成為每年新歲茶宴之後，皇帝頒賞給與會朝臣中能詩善文者的賞賜物。錢德明神父將茶碗上的詩抄錄下來，譯成法文後，於一七七〇年將這首《三清茶》詩附於乾隆皇帝描寫其祖居地的《御製盛京賦》譯著之後，一併出版。(註一)

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這兩個不同領域的學者，因為共同參與了物質文化史的研究而有所交集。因此在重建如藝術史家西蒙·沙瑪(Simon Schama)所說的「迷失世界的事實

(the reality of lost worlds)」等兩方學者皆關注的歷史與藝術議題的探討上，也產生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與觀點。沙瑪曾有力地闡述歷史與藝術之間的關係說：「歷史若缺乏有力的影

像佐證，便為晦暗不明的歷史，使讀者無從看清事實全貌；藝術若無文字記載，好比無聲的世界，使觀眾無法盡情的欣賞領會。」(S. Schama (29 March 2013), 'The Rijksmuseum



圖2-1 清 乾隆 霽紅御製三清詩茶碗 「乾隆御製」款 1746 高 5.6，口徑 10.8，足徑 4.8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也達到如藝術史學者陶格（Greg M. Thomas）所言，中法兩國在「重視彼此間的差異」的同時也「認同彼此間的相似」。（註一）

亨利·李奧那多·尚·巴蒂斯·貝爾丹（Henri-Léonard-Jean-Baptiste Bertin, 1720-1792）最為人所知的是他曾擔任路易十五（Louis XV，在位時期1715-1774）戰後時期的內政部長。（圖一）七年戰爭於一七六三年結束，當時的法國的社會危機正因戰敗結果而加劇。（註三）雖然貝爾丹在法國啟蒙運動大環境的塑造之下也成為民主改革的信奉者，但出生於一七二〇年，佩里戈爾地區（Périgord）穿袍貴族家庭的他，卻因長期獻身於維護君主制而使他的改革作風趨於溫和。貝爾丹早先在耶穌會學院內研習法律，之後迅速崛起並於一七五七年成為巴黎警署總長，緊接著於一七五九年獲擢升為財務總長，並於一七六二年至一七八〇年高居內政部長之位，人稱「小部長」。

任職部長期間的貝爾丹身擔重任，不僅負責國王私人的財務狀況，同時

也掌管著其他部門的事務，像是與中國有關的東印度公司、運河、道路、礦業、獸醫學，以及農業。他更於一七六七年被欽選任職為賽佛爾（Sevres）皇家製瓷廠總監，任職直至一七八〇年。最終於一七九二年，貝爾丹在流亡期間內逝世於比利時的斯帕鎮（Spa, Belgium）。

除了部長身份之外，貝爾丹也是一位深具鑑賞力的中國藝術收藏家。雖然他這收藏家的身份現今已鮮為人知，但是盧·文森·蒂埃里（Luc-Vincent Thiéry, 1738-1815）在他一七八七年著名的巴黎旅遊指南書中，不僅稱頌了貝爾丹在藝術收藏上的成就，更特別提到貝爾丹「與僑居北京的法籍傳教士保持長達二十餘年未間斷的書信往來」。（L-V. Thiéry (1787), *Guide des amateurs et des étrangers voyageurs à Paris*, Paris, pp. 134-36）而這幾百封貝爾丹與傳教士之間互通的書信，也成為了之後二十世紀初的法國史學家們如沙裏淘金般地搜尋、研究的對象。史學家們關注的焦點則為法國王室在一七六四年鎮壓耶

穌會之後，貝爾丹對耶穌會教團做出的資助。這批貝爾丹自傲地視之為文學創作的書信，記錄著主要與他通信的傳教士們在一七六五年至一七八六年間，從中國寄給他的各色各樣的工藝品與藝術品。這些通信者中包括了本文另一主要關係人，就是傑出的法國漢學家錢德明神父，以及二位曾留學法國的中國籍耶穌會教士高類思（一七三二—一七九五）與楊德望（一七三三—一七九三）。（註四）這三人利用可出入皇宮的職務之便，得以取得一般交易市場中無法尋獲的珍異寶。在這些寶物之中，包括了印本書、繪畫、漆器、硬石，以及幾件珍貴異常的皇家御瓷。但直至今日，這些瓷器都還未能得到鑑別，甚至無法被歸類。

我們在仔細研讀幾段與貝爾丹有關的文字後得到了一個重要的發現。在一八一五年《中國珍奇閣：貝爾丹遺藏展》（*Le Cabinet Chinois de Feu M. Bertin*）拍賣目錄中的「瓷器篇」，有一段對第二〇號拍品的敘述：「此碗有蓋，碗心內飾樹三株，碗壁及蓋

reopens,' *Financial Times*）本文延續沙瑪的論點，藉由連接起文字與物體間的關係來凸現出一種迄今仍被忽略

的十八世紀中法文化交流的形式。在此，本文主要關注的是交流過程中的詩詞，瓷器和國際政治之間的關

連。在豐富經驗的關係人從中穿針引線下，中國與法國之間的貿易互動與資訊傳播不僅促成了文化交流，



圖1 亞歷山大·羅斯林（Alexandre Roslin, 1718-1793）亨利·李奧那多·尚·巴蒂斯·貝爾丹 布面，油畫 縱174，橫113公分 右下角署名「羅斯林 1768」。 Château de Montréal（Dordogne, France）©Droits Réservé



圖3 潘廷章（Giuseppe Panzi, 1734-1812）錢德明 1789 紙本（高麗紙）油彩 縱63，橫47公分 引自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BnF），Département des estampes et photographies. ©BnF, Dist. RMN-Grand Palais / Art Resource, NY.

人數從十八人至二十八人不等。受邀之人皆為朝廷重臣，奉旨入宴品茶賦詩以頌揚三清茶高潔的品格。如此安排的茶宴儀式則反映出了皇帝對臣子道德修養的要求與朝廷政治的風氣走向。正如《三清茶》詩所描繪，這三樣物品各代表著不同的清雅寓意：梅花耐寒色彩清純不妖媚，佛手氣味芳

香清雅，松實入口清醇瑩潤，因而稱之「三清茶」。三清茶的「清」字與品德高尚，操守廉潔的清官的「清」字為同一字，乾隆宴請群臣品三清茶，實為教誨臣下要做一個潔身自好的官員。雖然目前尚未有明顯的證據顯示錢德明曾列席於三清茶宴，但依據上述的文字記錄推斷，我認為錢德

明神父應於一七六五年前曾受賞一隻三清茶詩碗。而為這位耶穌會教士贏得君心，得以沐浴皇恩的關鍵應為其自身深厚的文學素養。這些錢德明轉送給貝爾丹的瓷碗，亦很可能為首批有文字記載的，從中國傳入歐洲的清宮御瓷。

錢德明，字若瑟（Jean-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一七二八年生於法國土倫（Toulon）。雖然錢氏早年的生活尋常無奇，卻成就了其後來在中國的非凡事業。（圖三）（F. Picard (2008), 'Amiot', in F. Poullon, *Dictionnaire des orientalistes de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pp. 14-15）年輕時的錢德明學習神學與古典文學，一七三七年考上耶穌會，一七四六年獲任命為神父。三年之後，他以傳教士的身份前往中國，一七五〇年七月抵達廣東後，即刻受昭進京。在北京的錢氏很快地建立了自己的地位，最終成為乾隆的西方語言翻譯官。在他長達四十多年的在華傳教期間內（一七九三年逝於北京），錢德明悉心鑽研中國各方面的文化，在語言上尤其投入大量的心力。他不僅精通滿

面書有乾隆皇帝為此三物所賦之詩一首。由駐華傳教士錢德明神父將此詩譯成法文。原詩的轉錄及譯文，均附於《御製盛京賦》之末。」（註五）亨利·貝爾坦豐富的中國收藏品中有很大的部份都在這場巴黎拍賣會中出售。拍賣目錄上對於二〇號拍品的說明十分詳細，其中描述的茶碗，很可能與另外兩段描述在一七六〇年代從中國寄給貝爾丹的有蓋瓷碗的文字有著可相互印證的密切關係。其中第

一段文字為錢德明神父一七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致信貝爾丹中的一段描述內容，信中寫道：「兩件有蓋茶碗，上書寫有皇帝登基十一年時所作的御製詩，我已盡我所能地將之譯成法文。」（註六）第二段文字則為一份一七六九年的貨品清單紀錄：「兩件題有乾隆皇帝御製詩的蓋碗。」（註七）這三段分別寫於一八一五年與一七六〇年代的文字，共同顯示了一個這樣的訊息：這些文字描述的茶

碗之中，至少有一隻碗上飾有乾隆作於乾隆十一年冬天（一七四六）的《三清茶》詩。（P. Lam (1998), 'Tang Ying (1682-1756) the imperial factory superintendent at Jingdezhen',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s Society*, 63, pp. 67-71）《三清茶》詩讚詠的是三清茶所蘊涵的寓意：以梅花，松子，佛手三種品格芳潔，清正之物入茶，再以晶瑩純淨的雪水烹之，獨具幽香之氣，象徵性格的耿直與節操的清高。據說乾隆皇帝（在位時期一七三六—一七九五）一生共作御製詩文四萬餘首，其中不少詩文都會被書刻於官製的工藝品與瓷器之上。（圖二—一—三）



圖2-2 《鑾紅御製三清詩茶碗》碗心細節，內壁飾梅花，佛手，松實，是為「三清」。外壁飾乾隆御製《三清茶》詩一首。



圖2-3 《鑾紅御製三清詩茶碗》碗底細節，「大清乾隆年製」六字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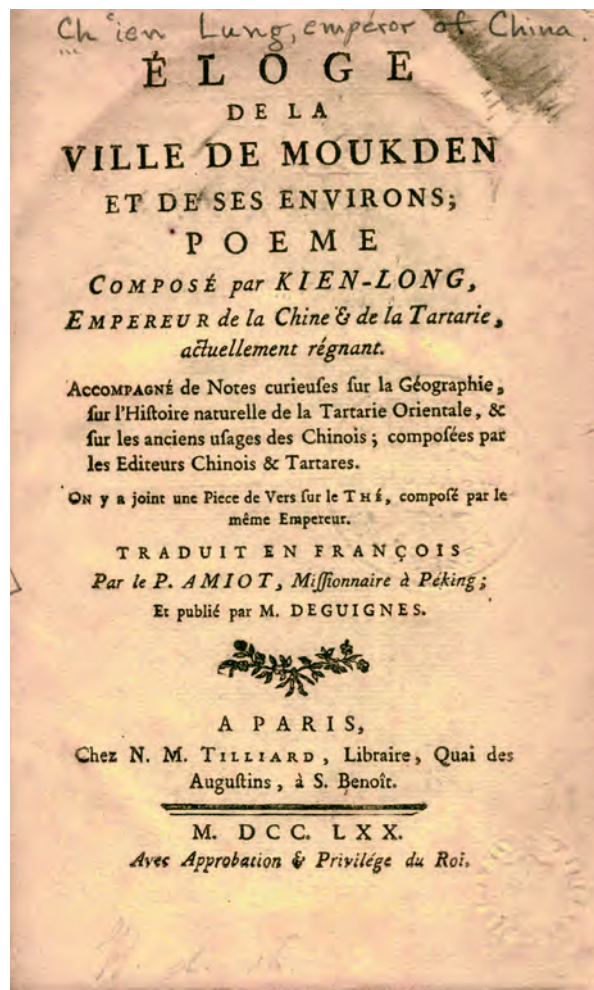


圖5 法文版《御製盛京賦譯著》卷首
l'Éloge de la ville de Moukden et de ses environs: poeme composé par Kien-Long, empereur de la Chine & de la Tartarie, actuellement régnant. On y a joint une pièce de vers sur le thé, composé par le même empereur. Traduit en français par le P. Amiot, Missionnaire à Péking; et publié par M. de Guignes. Paris, N.M. Tiliard, 1770. Courtesy of East Asian Library and the Gest Colle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荷商一六二三年與一六二六年的貨單上，便明列著他們的貨物中含有「文字紋」碗。以及法國畫家雅克·里納德（Jacques Linard, 1600-1645）也在其一六二七年與一六三八年的二幅靜物畫中的青花碗上，仔細描繪了一小段北宋蘇軾作於一〇八二年的《赤壁賦》。畫中瓷碗雖非官窑，然其呈現出的型制則可歸屬為明代天啓年間（一六二〇～一六二七）的瓷器。另外在薩克森選侯奧古斯特二世（Augustus II the Strong, 1670-1733）的一七二二年收藏清冊上也記載了兩件類似這種明代外銷瓷的現存物品。

錢德明在一七七〇年《三清茶》詩譯文的序言中，確實了《三清茶》詩是乾隆在長城以北的木蘭皇家獵苑行圍狩獵時所作，並依乾隆旨意，將其書寫於官窑製造的「特製瓷器」上。（註十）錢德明進一步陳述乾隆此行規模之浩大，隨圍者數千人，連同皇帝本人，所有入圍之人皆身著韃靼勇士裝束，露宿帳幕，藉以喚起滿人對「其古老族源的記憶」。騎馬射箭為古代滿族獵人尚武精神的核心；而詩書畫以及賞玩品鑑，則是漢族文人藝術中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錢德明將乾隆重視象徵滿州勇士氣概的騎

射武術，以及醉心代表漢族文人風雅的吟詩作賦、製題詩茶碗這二件事獨具匠心地編錄於同一著作中出版，形成巧妙的對照，是有其特殊的用意的。

此外，錢德明的序言也幫助我們了解他如何以一介文官的身份在乾隆皇帝與亨利·貝爾丹這二大政治人物間，居中調停斡旋。一方面，錢德明視君如父地尊顯出乾隆的博學多識，以及這位全能皇帝以詩人兼勇士的雙重身分，將漢滿傳統融合於一己之身。另一方面，錢氏則高明地將自己以中國通的傑出形象推薦給貝爾丹。因此他說：「要能融入理解中國的詩歌必須先熟諳中文，然後才能以我們的語言貼切地表達出乾隆皇帝詩文中的精妙細膩之處。」但他總結道：「我所呈現出的，充其量只不過是一件大師作品的複製品罷了，因為乾隆皇帝乃是大清國中最傑出的文豪之一，我望塵莫及。」藉由將《詠茶詩》推崇至如此高的文學地位，錢德明向歐洲觀眾介紹的乾隆不僅是一位博學之人，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化古國統治者。而那件錢德明呈獻給貝爾丹

清皇帝的母語滿文，也深諳漢文，因為滿、漢二文同為在清宮中供職必要的語言能力。一七七〇年，貝爾丹的另一個門徒約瑟夫·德經（Joseph de Guignes, 1721-1800）在巴黎發表出版了錢德明譯著的，乾隆作於一七四三年的文學大賦《御製盛京賦》的法譯本，為《御製盛京賦》譯著是也。

（註十）此著中還包括了另一首乾隆御製詩，即《詠茶詩：同為乾隆皇帝所作》。（圖四、五）

不同於《御製盛京賦》般享有盛名，這首附錄於後的《詠茶詩》則完全遭到世人忽略。《御製盛京賦》歌頌先祖創業之功並讚揚盛京物產之豐，為乾隆為盛京這座被馬克·歐立



圖4 《御製盛京賦》 清乾隆13年（1748）武英殿刊三十二體篆文本 32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德（Mark C. Elliott）描寫為「滿洲族神異的發祥聖地」所作的大賦。（M. Elliott (2009), *Emperor Qianlong –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New York, pp. 58-9）透過官方宣傳發布此賦來贊美頌揚滿洲族並提升其民族神話地位，乾隆不僅成功地進一步確立了滿清先祖的正統地位，更加強鞏固了滿清皇帝所宣稱的天命所歸王權。另外，錢德明將這些詩賦文字結合起來以法文一起出版，不僅表明了他對乾隆皇帝的看法，也揭示了這批錢德明先受賞於乾隆，後來進獻給法國大臣貝爾丹的御瓷茶碗所具有的宣示意義。

如同一七六六年那段文字所述及，錢德明是先從飾有「文字紋」的御瓷茶碗上抄錄下《三清茶》詩，之後再譯成法文。這說明了錢德明其實感興趣的是書寫在瓷器上的詩文，而非器物本身。不過他並非為第一個對這些瓷器詩文感興趣之人。歐洲人早在十七世紀就已經接觸到飾有中國文字的外銷瓷器。（C. Jörg (1997),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ondon, p. 51）在兩件

的題詩茶碗，也因此成為了代表乾隆皇帝輝煌成就的最佳範例；貝爾丹即透過此碗來認識、景仰，以及思量乾隆之卓越偉大。乾隆的過人之處，在於他不僅為中國古代文化、宗教以及政治各方面傳統的擁有者，更是一個守護者。

因此，錢德明神父的三清詩茶碗扮演的是一個重要典範的角色，它成功地演示了某個特定的美感與政治觀點，如何通過如瑪克辛·伯格（Maxine Berg）所謂的「知識社群」（Knowledge Communities），從一個國家文化傳播到另一個國家文化。（M. Berg (2008), 'In pursuit of luxury, global history and British consumer good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st & Present*, 182, p. 104）耶穌會教士在清廷中組成的這樣的基督教與歐洲科學的知識社群已行之有年。另外，除了為他們的歐洲主子獲取中國的稀奇珍寶，傳教士們也同時將有關中國的重要資訊傳至歐洲。雖然這類的事蹟，特別是有關貝爾丹的部分，大多遭到藝術史學者的忽略。但毫無疑問地，

在中法文化交流中，耶穌會教士無論在知識性或者實用性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

貝爾丹在事業上以追求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著稱，並且他將中國宣傳為一個值得歷經了七年戰爭，滿目瘡痍的戰後法國學習模仿的對象。不過，若非有錢德明以及另外二位中國傳教士高類思與楊德望為他提供有關的中國情報，貝爾丹即便再積極地擁護鼓吹其公共政策，也無法得到如此普及深入或有影響力的成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貝爾丹將這些獲得的情報，以創新改進的手法應用在塞佛爾瓷廠的瓷器改進研究上，使人們得以透過對古代器物原型間的相似性的思考，進而互相理解並認同中法兩國文化間的差異。對於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貝爾丹與傳教士通訊時，對於獲取「真實可靠」資訊的高度重視。而這些來自於遙遠東方的資訊，最後成為有助於歐洲瞭解他國文化的、實用的啟蒙知識。

作者為英國華威大學歷史系副研究員
譯者為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抗特學院藝術史碩士候選人

註釋

1. 本文為筆者另一篇著作的衍生。該文先於二〇一二年十二月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Global Commodities: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Global Connections, 1400-1800」研討會上發表。其後刊於二〇一五年倫敦布盧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出版・A. Gerritsen 與 G. Riello 合編的 *Writing Material Culture History* 一書中。紐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已故的 Walter Liedtke 先生、巴爾德研究所（Bard Graduate Center）的 François Louis 教授，以及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 Kristel Smentek 教授，都在筆者不同寫作階段中慷慨地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我也十分感激 Mallet PLC 的 Min Zheng Veneau 女士在我寫作初期時協助我翻譯中文資料。以及胡欣以女士完滿地將原文譯成中文，並協助處理本文為刊登在《故宮文物月刊》所需的大量準備工作。
2. Thomas (2009), 'Yuanming Yuan/Versailles', p. 117.
3. Silvestre de Sacy (1970), *Henri Bertin*，是亨利·貝爾丹的標準傳記。並見 Lee (2002), 'L' enjeu politique et religieux', pp. 87-99.
4. 有關高類思與楊德望的傳記資料，見 Lee (2002), 'L' enjeu politique et religieux', pp. 88 and 98 (note 2).
5. Une tasse avec son couvercle: on voit dans le fond de la tasse trois arbres, pour lesquels l' Empereur Kien-Long a fait des vers qui sont

- gravés sur la tasse, et le couvercle. Le père Amiot, missionnaire à la Chine, les a traduits en français. La transcription et la traduction se trouvent à la suite de l' éloge de Moukden. Delaroché and Moreau (1815), Notice, p. 9.
- 一七九一年，保皇派亨利·貝爾丹去世，其時流亡於位在現今比利時的斯帕（Spa）。之後他廣泛的中國收藏品中最大的一部分，特別像是手稿、印刷品和繪畫等，都遭法國政府沒收充公，存放於前身為法國皇家圖書館的法國國家圖書館。其餘剩下的無數的工藝品、陶瓷器和五百多張的圖書則流入藝術市場，其中部分物品便是從此拍賣會中賣出而流散至世界各地。拍賣目錄上對於二十號拍品特別詳盡的說明證實了貝爾丹擁有至少一件的清詩蓋碗，而其中幾件為錢德明在十八世紀六〇年代後期從中國寄給他（見註五和註六）；同時，目錄也證實了錢德明是從三清詩茶碗上抄錄下的三清茶詩，然後將之譯成法文並將其譯本與更長的《御製盛京賦》譯著於一七九〇年在法國巴黎共同發表（見註十）。
6. '40 2 tasses avec leurs couvercles sur les quels sont des vers faits par l' Empereur lui même, la 11e année de son regne, et que j' ay traduits en français le moins mal que j' ay pu.' Institut de France, Ms. 1515，在錢德明致貝爾丹的一封信中，末尾附有寄出物品的逐條記錄，一七六六年，九月十三日。書頁（左頁）。並見 Bernard-Maître (1948), 'Catalogue', p. 125.
7. 'deux tasses avec des vers de l' Empereur TCHIEN-LONG.' Institut de France, Ms. 1524，在一份一七六九年由中國寄出的物品記錄清單中。第一三三三

- 號書頁（左頁）。並見 Bernard-Maître (1948), 'Catalogue', p. 132.
8. 依年代排序的題詩茶碗圖例可參見《懷抱古今》・澳門藝術博物館・一〇〇一・頁二五八—二五九（一四四六）・頁二六一（一七五九、一七六四）・頁二六六—二六七（一七九一）。
9. 見廖寶秀・《也可以清心》・一〇三・頁一五一—一五三。作者文中提及的乾隆宮廷的一件茶碗原作，其中兩件的圖例請見目錄編號二一九（圖一之一）及編號二二〇。至於乾隆在新春茶宴中，以《三清茶》碗賞賜臣下部分，參見廖寶秀・《茶韻茗事》，二〇二，頁九三—九六。十分感謝廖寶秀女士與筆者確定乾隆時期所舉辦的茶宴次數以及每年不定的入宴朝臣人數。
10. 乾隆皇帝・《御製盛京賦》譯著，一七七〇。錢德明編製的《御製盛京賦》譯者根據的是「一七四八年清內府印製的滿漢文《御製盛京賦》，之後錢德明將其於一七六九年送往國王圖書館（Bibliothèque du roi）。但由於廣州口岸的海關問題，此版本直至一七七一年才抵達法國，抵達的時間比本文中錢德明的譯本在巴黎出版的時間還晚。見《中國》・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一〇〇四・頁一八—一九二。
11. 此處或文中他處提及的序言全文，見乾隆皇帝・《御製盛京賦》譯著，一七六〇・頁三三—三三三。

參考書目

1.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2004), *Chine, l'empire du trait: calligraphies et dessins du Ve au XIXe siècl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 France.
2. Bernard-Maître, H. (1948), 'Catalogue des objets envoyées de Chine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1765 à 1786',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Aurore*, 33-34, pp. 119-205.
3. Delaroché, H. and Moreau (1815), *Notice des articles curieux composant le cabinet chinois de feu M. Bertin, ministre et secrétaire d'état sous Louis XV et Louis XVI*. Paris: Grapetlet.
4. Lee, C-Y. (2002), 'L'enjeu politique et religieux des modes de représentation dans les 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 (1776-1791)' *Histoire de l'art*, 51, pp. 87-99.
5. 廖寶秀・《茶韻茗事：故宮茶話》・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〇一一。
6. 廖寶秀・《也可以清心》・茶器、茶事、茶畫》・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〇三三。
7. 澳門藝術博物館・《懷抱古今：乾隆皇帝文化生活藝術》・澳門：澳門藝術博物館，一〇〇一。
8. Qianlong, Emperor of China (1770), *Éloge de la Ville de Moukden et de ses Environs*.. Traduit en François Par le P. Amiot. Paris: N.M. Tillard.
9. Silvestre de Sacy, J. (1970), *Henri Bertin dans la sillage de la Chine*. Paris: Cathasia.
10. Thomas, G.M. (2009), 'Yuanming Yuan/Versailles: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European palace cultures', *Art History*, 32, 1, pp. 115-143.